

人面鱼形四鸟纹盾牌有关问题初探

文山州博物馆 刘永剑

1997年11月13日,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阿科乡普圈村村民龙兴平上山挖草药时,挖到一件青铜器,现藏于文山州博物馆。

该器长28.2、宽13、厚0.2厘米。外形象一条鱼,尾部朝上,呈凹圆叉角状,下方渐收成圆形,似鱼的头部。器身正面饰人面纹,以双线勾勒,脸部呈三角形,额头、眼眉部分有竖条“羽毛”装饰,圆眼外凸呈圆锥状,鼻梁高挺,张口露齿,尖颌上翘,鼻、唇、颌饰圆点纹,神态狰狞;面部下方为四只连体飞翔的鹭鸟。器表除主体花纹外均用圆涡纹填地;背面无纹,只有三个凹陷部分对应人面的眼、鼻突出部分,上下方各铸两个三角形绳扣,以便持拿。(图一)此器物想象丰富,造型奇特,图案精美,做工细腻,且在云南省为首例发现,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从形制、尺寸看,此器物有可能是一件形如盾牌的随葬明器。它是真实盾牌的微缩,也是墓主生前的爱物,既反映了墓主的身份、地位和喜好,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、生活习俗和青铜工艺水平。我们试想将其放大4—5倍,就完全符合盾牌的正常比例,凹圆部位方便持盾者露出眼睛查看战况,两边叉角能很好保护头部,背面绳扣系上绳子后,手臂从中穿过握住盾牌,既能牢固持拿,挡住敌方的刀、箭,又能抵御较大力量的冲撞,防护身体。正面的眼突,似两枚尖锐的“刺”,前进过程中可作为攻击型武器使用。人面瞪眼呲齿的狰狞形象,又给予敌人以威严、凶悍的感觉,具有恐吓、震慑的作用。

由此判断,古人当时实际使用的盾牌与此器相比可能形制相似而尺寸不同,但估计不可能完全由青铜铸造,否则过于笨重,使用必然不便。当时的盾牌有可能是木制或其他材料制作,类似此器物的青铜盾牌则仅用作明器。还有另一种可能是,将此器镶嵌在藤牌或木器上,这样既起到装饰作用,又节约了青铜材料,同时还轻便实用。

盾,较早记录见于《山海经》:“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,羿射杀之。在昆仑墟东。羿持弓矢,凿齿持盾。一曰戈。”^①是古代重要的防御型兵器,所以种类繁多,多用皮、木、藤和金属材料制作。在云南境内的考古材料中,也发现有关盾牌的形式和使用盾牌的情况:在沧源岩画第一地点2区,出现有一手持长方形盾牌、一手持短兵器的人像;(图二)第六地点6区(上)出现5个一手持盾、一手持短兵器的人像。^②(图三)岩画表现了盾牌的两种形式:一种为长方形,上端略大;另一种也是长方形,但在上端中间有一缺口,为了便于战时窥视敌方的动静。后一形状的盾牌与文山广南县出土的盾牌(明器)较为相象;另外,在晋宁石寨山第十四号墓出土的一件铜鼓的腰部,装饰有六组一手持盾、一手持短兵器的羽人图像,盾牌多作上大下小的长方形。^③(图四)

据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记载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……”和《后汉书·西南夷·夜郎传》：“武帝元鼎六年，平南夷为牂牁郡，夜郎侯迎降，天子赐其王印绶。”在西南夷部落中，因夜郎最大，便以夜郎统称以什数的南夷部落，句町是其中之一。秦汉时期，“西南夷”各民族群体内部和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，一直是不平衡的，为了兼并领地，掠夺对方的财富，纷争不断，“且兰君恐远行，旁国虏其老弱。”^④即便同属部落联盟集体内部的各部落之间，仍频繁的相互发动战争，兵器对于一个国家或部落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，统治者不惜财力制造各种兵器，维护领土安全。西汉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牂牁郡，辖十七县，句町为其中之一。句町国位置何在？按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句町，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，又有卢唯水、来细水、伐水。”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温水条也提到文象水“其水导源牂牁句町县”。据《新纂云南通志》考订，文象水即是今之西洋江，郁即郁水，即郁江，卢唯水就是今天的驮娘江，蒙水、来细水、伐水是西洋江的支流。从地望看，句町故地正好位于今云南的广南县、富宁县和广西的百色县等地。因此，这件出土于广南县阿科乡的盾牌，为汉代句町古国先民遗存的可能性极大。

此盾牌的形制及其装饰图案很有特色，如：几何形纹用S形纹、螺旋纹（勾连云纹）、圈点纹来装饰，动物纹则用鱼、鹭来装饰。整个画面运用了不同动物的形体特征来组成生动自然、栩栩如生的图案，表现了人们的生活与自然界的动物息息相关，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景象：先民居住在河流纵横的高原区，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，但多为刀耕火种、轮歇休耕，人们的食物还要通过渔猎来补充。他们善于操舟捕鱼，或利用飞禽辅助捕鱼。其以当地自然界实际存在的动物形象和常见的几何纹饰，来表现当时社会的劳动、生产、生活的艺术表现手法，与云南青铜文化滇池区域类型的青铜器有较多共同之处，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。

根据本地区发现的代表性青铜器物（铜鼓、靴形铜钺、尖叶形铜镞、一字格青铜剑、羊角钮钟等）有部分“滇池区域青铜文化”的典型器物，说明本地青铜文化与滇文化有着亲密的联系，鱼形盾牌的断代可参照“滇文化”的时代。另外，沧源岩画已较多地出现了盾牌的图像，盾牌实物的出现应早于岩画的年代，而沧源岩画的年代（战国——西汉），^⑤稍晚于云南青铜器流行的年代，故推断这件器物的时代大致在西汉。

遗憾的是鱼形盾牌在出土时没有其他遗物伴出，在没有更多佐证的情况下，只能就器物本身略作介绍，并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，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，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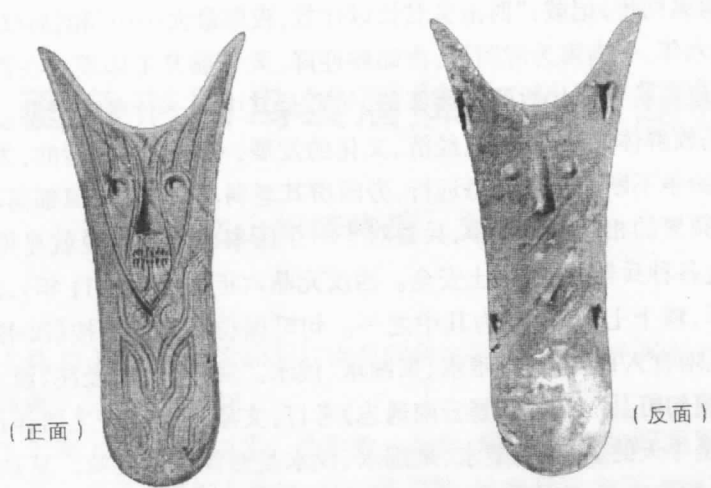
注释：

① 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卷六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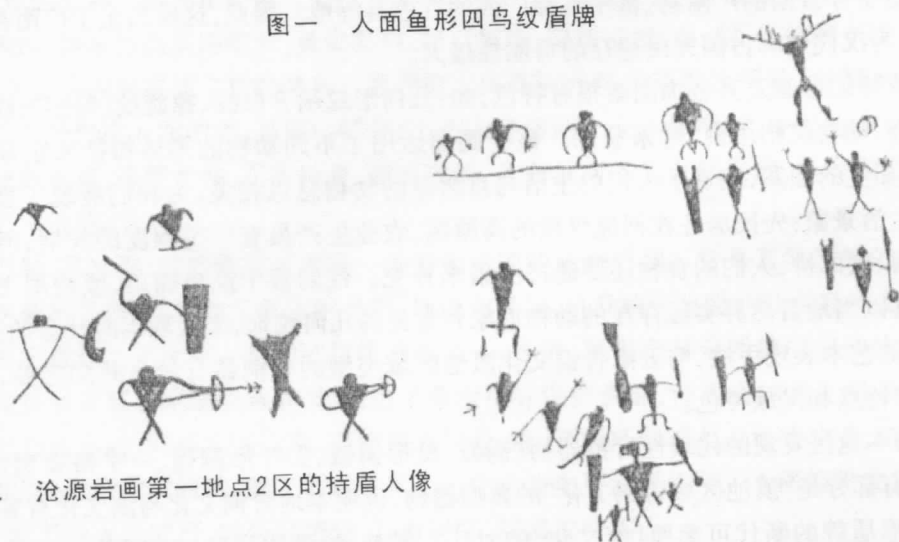
②、⑤ 汪宁生：《云南沧源岩画的发现与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3月。

③ 云南省博物馆编著：《云南省博物馆铜鼓图录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9月。

④ 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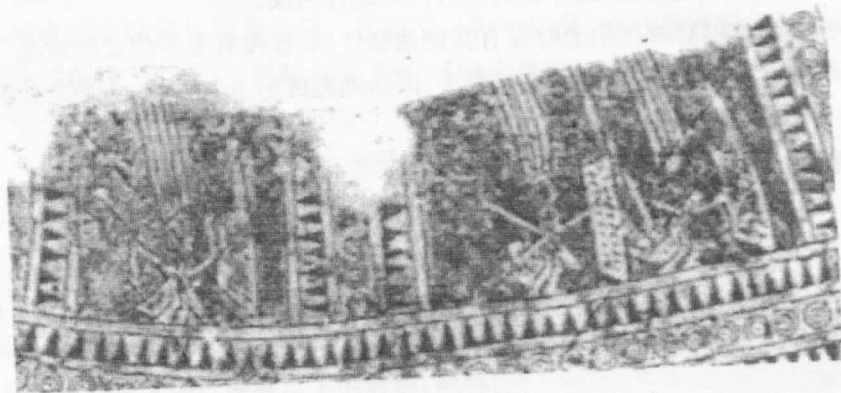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一 人面鱼形四鸟纹盾牌



图二 沧源岩画第一地点2区的持盾人像

图三 沧源岩画第六地点6区(上)的持盾人像



图四 石寨山铜鼓腰部持盾羽人纹